新观察

网络文学的现状与可能

□王晴飞

虽然“新文学”诞生至今已达百年，但是百年前开始发生的“意义震荡”并未尘埃落定。在这一情境中，通俗文学缺乏稳定的伦理根基，便只能向制造“爽点”努力发展。

在网络文学诞生之初，人们对它寄予的期待，一度是对纸质文学的解放，希望出现一种比纸质文学更自由、更先锋的文学样式。而今天网络类型文学的特性，与其说是代表了“网络性”，毋宁说是更亲近“商业性”。

网络文学的出现并兴盛，给“传统文学”带来了一重新的含义。以前人们所谓的传统文学指的是古典文学，与之相对应的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现在的传统文学，指的是纸质文学，与之相对应的是网络文学。五四新文学的出现，是以反对旧文学即古典文学为标志的，然而在新的网络媒介的映衬下，新文学却与它所反对的古典文学被归为一类，统称为“传统文学”。

正如任何命名都意味着一种权力，在一个以“新”为正面价值的时代，将纸质文学命名为“传统文学”，代表了网络文学将纸质文学扫进历史的冲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之“新”，就文学载体而言，是语体文取代了文言文；就价值观念而言，是横向移植来的现代价值取代了中国的传统价值。网络文学之“新”，首先也体现在媒介的转换，以及由媒介转换带来的文学生产方式对纸质媒体限制的突破。

今天的人们提到网络文学，往往指的是网络类型文学，因为无论在作品数量、受众以及所凝聚的资本与流量方面，类型文学显然都是网络文学中一个巨无霸式的存在，以至于被当作网络文学的代称，许多网络文学的从业者和支持者宣称网络文学已经取代纸质文学成为“主流文学”时，所指的也是网络类型文学。

网络类型文学由于媒介和生产方式的不同，自然产生了许多与传统纸质文学不同的特质，譬如由于商业资本的介入，网络类型文学彻底以读者为本位，以模式化的方式分门别类地为读者制造“爽点”，网络写手成为白日梦的织造者，对读者进行麻醉式的心灵按摩，使其满足于梦游式的“一晌贪欢”。网络类型文学的生产与消费流程，真正地实现了“顾客就是上帝”这一俗语。网络类型文学的核心要点在于功能性的“网络”，而非审美性的“文学”。

不过如果撇开既定的“新”与“旧”来看网络文学与纸质文学的话，则可以看出网络类型文学“新”得其实很有限，甚至呈现出“似新实旧”的特点。如果我们在“古典”与“本土”意义上理解传统的话，则网络类型文学与传统（而不一定是传统文学）之间联系的紧密度其实远甚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甚至可以说网络类型文学是传统文学越过新文学的隔代遗传。

网络类型文学的写作资源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源自欧美的流行文化，一是动漫、游戏文化（所谓AGG）的影响，一是中国传统文学以及五四以后被压抑的通俗文学。新文学作为一种横向移植的精英文学，与传统文学是一次断裂，虽然在文学载体上采用了传统通俗文学的白话语体，但也只是借助传统文学中的边缘力量以反对正统。胡适撰写《白话文学史》为白话文学张目，鲁迅即认为他有过度向历史中寻找例证的倾向，认为“白话的生长，总当以《新青年》主张以后为大关键”。在思想和审美层面，新文学也更多地是师法西方现代文学，以改造而非迎合本国读者的思想与趣味。而传统白话文学作品，在新文学的倡导者们看来，也需要经受现代文学观念与时代价值理念的检验与淬炼。周作人的著名理论文章《人的文学》，便提倡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并以此检验中国旧文学。而在周作人这一现代观念的审视之下，中国传统文学达到及格线以上的极少，可见五四新文学之于传统通俗文学，所取的主要是“白话”的形式，而同时要对其不符合现代价值观念的思想内容做消毒处理。所以它虽然取法传统文学中的“俗文学”，自身却是雅文学，尽管注意大众，其指向则在启蒙，目标在通过文学改造其思想，而非固化其既有观念，对于同样以白话文写作而迎合大众趣味、带有旧式道德观念的“通俗文学”，并不予以认可。因而五四新文学的批判指向，一面是以诗文为代表的传统正统文学，一方面是“黑幕小说”、“鸳鸯蝴蝶派”、“武侠小说”等通俗文学。

也正因如此，五四新文学虽然在意识形态层面成为主流文学，但就读者数量而言，并不能超过鸳鸯蝴蝶派等通俗文学。鲁迅在一般民众中的接受度，也不能超过张恨水和还珠楼主，以及更晚近的金庸、琼瑶。而网络类型文学，既以读者为本位，要为读者提供更为友好的阅读界面与阅读体验，尽量避免太过陌生化的审美冲击，自然要迎合而不是挑战（如五四新文学那样）读者的审美趣味、心理结构、伦理观念，所以反而显出更具保守性的文学观念。从文学渊源上说，网络类型文学以中国传统话本、明清通俗小说为远祖，以五四以来被新文学主流压抑的武侠、言情等为近祖，更具有本土性。

网络类型文学的“新”与之前的类型文学相比，并不在其提供的文学质素之新，而在其程度的深广。网络类型文学的一大特点，是“爽点”制造的密集和爽度之深，即口味既重而量又管够。在传统的文学批评术语中，虽然没有“爽点”这一词语，并不代表传统的通俗文学不提供爽点，即以金庸等人的武侠小说为例，情节套路多半也无非是底层少年通过不断的成长、学艺、获得机缘，从而走上人生巅峰，郭靖参加华山论剑，张无忌成为明教教主，虚竹平白获得两百年功力、接手灵鹫宫、拯救少林寺……这些桥段，无一不给读者提供了极大的心理满足（即爽点），只不过金庸更懂得叙事节奏的把握，讲究高潮与低谷的搭配平衡，而不一直以爽点轰炸读者。

被称为“第一奇书”的《蜀山剑侠传》，从文本到生产、流通过程其实都已具备了今天网络类型小说的诸多特征。从体量上看，《蜀山剑侠传》约四百余万字，不输于大部分网络文学，并同样是以“日更”的方式在《天风报》连载，同样给读者提供各种“爽点”。只不过那时的读者对“爽点”的量和质的要求都与今天的读者有差异，在今天的读者觉得不够“爽”的地方，当时的读者已经觉得“很爽”。甚至今天许多网络类型文学存在的问题，在《蜀山》中也已存在，譬如因连载和体量过大而导致支线情节的枝蔓臃肿，以至于冲淡了主线情节。

当下网络类型文学相较于此前文学的特点恐怕还不在其“新”，而在其文体等级的“低”和亚文化属性。网络类型文学在今天的发展虽然甚嚣尘上，但其实尚处于粗糙的初级阶段，只是粗犷型的大批量重复生产，虽然处处封神，但并没有诸如仙侠之还珠楼主和新武侠之金庸这样的作者出现。在中国传统文类中存在颇为严格的等级关系，即文＞诗＞词＞小说戏曲，这种等级关系的存在，常常使人们忽略了同一文类内部亦有等级之分，譬如唐传奇和宋元话本、明清小说在今人看来，都是小说的渊源所自，但唐传奇显然属于高级文体，即便在白话小说内部，《红楼梦》《儒林外史》《金瓶梅》也不宜与一般话本小说视为同一种文体，其中仍然有着高下之分。高级文体从作者的角度来说其一大特征是文人化，有着精密的思想和精致的叙事，论者不察，常因载体（白话文）或文类（小说）的相似，而将其归为一类，其实《金瓶梅》《红楼梦》之于一般话本小说的差别远大于文言之于白话、诗文之于小说。而网络类型文学的现状，正说明其尚处于“低级”文体阶段，有赖于真正的“大神”来提高这一文体的地位。

网络类型文学亚文化属性的另一表现，是其文本并不具有统合性的伦理观，无论作者还是读者，都不追求普遍适应于整个社会的道德观念，这也是当下网络类型文学与还珠楼主、金庸等文人化通俗文学的重要区别。《蜀山剑侠传》虽是修仙小说，但讲究正邪之辨，综合儒释道，尤其强调“无不忠不孝的神仙”，金庸的小说更是努力调和古今，尽量照顾社会各阶层的伦理观念与审美趣味，使其尽量涵盖社会各阶层，而网络类型文学中则盛行赤裸裸的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等，并不能使各阶层的读者都感到满足，所以虽然粉丝足够多，但受众阶层却相对单一。

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相比，网络文学看似与传统的关系更近，也具本土性，不过其中的“传统”往往是无意识的、碎片化的道教思维的体现，它们对于传统文化很少整体性的吸收与创造性的转化，更多的是零碎的拼贴，只是摭拾一些片段式的零星元素，唤起读者熟悉的审美情感。这一方面源于目前的网络写手多半并不具备整体理解传统文化的能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类型文学的写作与接受中，传统文化只是一件使读者易于辨识的标识，使其更顺畅地进入文学梦境的通道，以尽情感受作者提供的各种“爽点”，这才是类型文学的内核。

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其实都需要与传统进行沟通，无论是批判还是继承，都要重建当下与传统的关系。一个有效的方式，是既以传统文化的源头之水来洗濯当下经验，加深我们对自身和世界的理解，另一方面也以当下的现实与经验擦拭传统，使其时时保持活力，“苟日新，日日新”。这一任务一般是由严肃文学来完成的，作为类型文学的通俗文学一般并不具有更改旧秩序、寻找新意义的功能，它的作用在于将已达成共识的新意义与道德伦理观传达出去，巩固既有的为社会普遍认同的道德伦理观念。

而当下的问题在于，虽然“新文学”诞生至今已达百年，但是百年前开始发生的“意义震荡”并未尘埃落定。官方层面的主旋律文学，常因刻意拔高而与民众隔膜，处于雅文学位置的纯文学则日益退缩，与大众越离越远，未能产生一种为社会各阶层普遍认可的新的道德伦理观。在这一情境中，通俗文学是缺乏稳定的伦理根基的，它的“阳面”（意识形态）没有了着落，便只能在“阴面”（爽点）努力发展。

在传统社会中，低级文体作品往往只能存留于说书人之口，多半不能化为文字，入于士大夫之耳目，网络类型文学在今天却可以借助网络的力量，携带着粉丝和流量之力，强行“逆袭”，冲击现有的文学权力格局，以流量影响文学判断，这才是网络文学带来的最大的变化。对此我们不宜评价过高，也不必大惊小怪，不妨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以上的论述中，网络文学都被等同于网络类型文学，就现状而言，或许的确如此，但这只是“实然”，而非“应然”。在网络文学诞生之初，人们对它寄予的期待，一度是对纸质文学的解放，希望出现一种比纸质文学更自由、更先锋的文学样式。而随着商业资本的介入，读者本位的出现，类型文学几乎成了网络文学的惟一面目，今天网络类型文学的特性，与其说是代表了“网络性”，毋宁说是更亲近“商业性”。当然，如果我们以1998年痞子蔡（蔡智恒）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为起点，网络文学发生至今不过20年，仍可视为草莽时期，虽然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与纸质文学间并无有效的互渗，更不具备取代后者的可能——二者其实分担着文学的不同功能。在未来的文学发展中，如果网络媒介真正取代了纸质媒介，则纸质文学的传统移入网络，那些隐藏于“网络文学”这一概念之下而被类型文学遮蔽的诸种可能性，也必将被重新激活，使网络文学显出更为丰盈的面目。

■关 注

做西部文化的传承者

——徐兆寿《问道知源》读札

□朱翔宇

徐兆寿是一位有思想、有灵魂的作家，他时常游历于西部这片荒野中，也常常遍访名胜古迹，穿梭于庙宇佛窟之间，追踪溯源，问道于古今。其年轻时的长篇小说《非常日记》和汪洋恣肆的长诗《那古老大海的浪花啊》，今日读来，仍然令人心动和热血澎湃，那些文字始终遵从着他自己内心的选择，拷问灵魂，质疑存在，直抵信仰。2010年是他的转型时期，他完成了东西文化碰撞下百年中国知识分子追寻中国文化未来的《荒原问道》，后又推出在古今文化对比中寻找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鸠摩罗什》，一横一纵可见其雄心抱负。此后，徐兆寿从今日尚存的一些中国传统文化遗迹出发，不断发问，完成了长篇文化散文集《问道知源》。在“问道三部曲”中，作者经历了迷茫期、探索期和完成期。所谓“问道”，就是要回到中国的源头，回到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回到当下，重新打开富有魅力的青春国门，以中国来面向世界，点燃中华文明的香火。

这便是继往开来。徐兆寿从中国出发，重新梳理和吸纳中国的传统、西方文化和世界文化。《问道知源》涉及儒家文明、道家文化及佛教文化，作者秉着严谨的学术态度抒发对古代贤哲的重新理解与西部文化的独有情怀，深刻揭示了百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重视以世界来看中国，却忽略了以中国来看世界的世界观，进一步探讨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等问题。阅读此著，总是被作者沉重的使命感所打动，也总跟着作者一道重新发现和感受丝绸之路与西部文化的独特魅力，一种文化自信油然而生。本书最感人至深处，唯《十年一拜》莫属。在曲阜，作者从两千公里之外特意赶去参拜孔子，满心虔诚的跪拜举动，让我们看到了作者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

关于学术，作者鼓励我们应当向今天一切可以学习的国家和圣贤学习，培养广泛的兴趣和对学术无止境的探索精神。今天的知识分子也不再像古人一般秉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的态度，更多时候，往往是把立言和立功放在首位，立德最后。作者真切希望每一位学者都能从心出发，在探究宇宙人生之真谛中获取人生的至理，培养至纯之人性，养成圣贤品格。

作者将最多的笔墨给了敦煌。书中客观地解读了曾在一些人笔下被扣有“卖国贼”、“叛道者”、“千古罪人”等帽子的王圆箓，作者拿出大量的历史细节反驳了一些人的观点，更多的是将历史罪责推给那些目睹了经卷却又不识经卷的知县、道台，推给那些旧知识分子。在他看来，王道士也是因缘际会的结果，他卖经卷是为了重振莫高窟，是为了弘扬佛法。在那个儒释道合一的时代，身为道士的王圆箓的行为在今天是可笑的，但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那时还没有文物的概念，所以在很多知识分子看来，那些经卷是国家的至宝，但在一个道士看来，不过是弘扬佛法的器物而已，更何况那些东西是信仰者留下的遗物，它们的作用仍然是为了弘扬佛法。把它们给予别人，在佛法看来，不过是结缘的一个法门，这构成了王圆箓和众多知识分子之间的巨大鸿沟。徐兆寿通过考证研究，发现斯坦因和伯希和把盗去的文物在欧洲展出后的第二年，欧洲便出现了佛教协会。盗经在这时变成了传播佛法的手段。在此，徐兆寿告诉人们，在世人看来，莫高窟的劫难虽是中国文物的伤心之处，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又是佛法走向欧洲的契机。与此同时，作者重新考察王圆箓此人，发现王圆箓最初是求道者，但在后来犯了贪戒，所以使得莫高窟的文物大量外流，并种下了后世的骂名。初为弘道者，后为犯戒者。这种理解，自然也是超越了当下众多的书写。

类似这样的重新发问与理解，在本书中还有很多。《问道知源》的问世，为我们重新打开了通往丝绸古道、西部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交汇的大门，那袅袅青烟、漫漫戈壁、无边沙漠，以及古色古香的陶器等，无不让我们感受到西部文化独有的魅力，让我们真实地了解到生机勃勃的古丝绸之路。

萨迪说过：“事业常成于坚忍，毁于急躁。我在沙漠中曾亲眼看见，匆忙的旅人落在从容的后边；疾驰的骏马落在后头，缓步的骆驼继续向前。”徐兆寿可能就是那从容的骆驼。

（上接第1版）

朱钢的努力收到了实在的成效，不少朋友在朱钢公众号中纷纷留言，说他“发现了一个人间仙境”，也有临潭出门在外的游子，说看了朱钢的照片“才发现家乡竟然这么美”。临潭当地的干部群众也对朱钢的做法高度肯定。当朱钢开玩笑地表示自己“只能来点虚的，不像其他扶贫干部那样能拉来项目”时，他们认真地说：“你做的事情，从来没人做过，是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是啊，扶贫要先“扶志”、“扶智”，朱钢的文学与摄影作品激发了临潭人对家乡的自信心与自豪感，中国作协的系列举措提升了临潭的知名度，激活了临潭的旅游资源，创造性地探索出了一条作协扶贫、文学扶贫的新路。

朱钢最让临潭人敬佩的是他的在岗状态。“除了正常年休假和探亲假，该同志从没有请过一天事假病假，挂职965天，实际在岗855天，如此高的在岗时间，可以说是所有挂职干部‘真蹲实驻’的典范。两年多来，该同志走遍了临潭县16个乡镇，足迹遍布130多个村（含自然村）和230户贫困家庭，累计下乡达410多天520余次。”但是谈起如此之高的“在岗率”，朱钢说他其实也有“私心”，他去临潭那年48岁，如果频繁地来往北京，在高海拔与低海拔地区之间穿梭，他担心自己的身体承受不住。还有一件事让他担心，“我母亲肺癌晚期，除了春节回去看望，其他时间我不敢回。一旦假期用完了，如若她老人家有个三长两短，我没有时间回去的。”刚决定去临潭挂职时，朱钢甚至不敢告诉母亲，他让哥哥先给母亲透个风，过了几天才给母亲打电话，母亲不识字，不知道甘肃，更不知道临潭，但知道这地儿很远很远。

刚到临潭时，朱钢不仅要忍耐情感上的思念，也要忍耐物质条件上的不适。朱钢是江苏东台人，平常习惯于吃米饭，而临潭是高寒地区，人们喜食牛羊肉，三餐以面食为主，没有米饭，他只好慢慢习惯面食。住的地方就是办公室，没有条件洗澡，他只好减少洗澡的次数，只有在接待检查组时，跟他们关系处好了，到他们所住的宾馆中“蹭”个澡洗。还有洗衣服，刚来时不知高原的水有这么冷，一双袜子没洗完，手指就被冻木了。后来他买了一副橡胶手套才解决了问题。但是最让朱钢不适应的，还是海拔问题。朱钢曾当过25年兵，身体素质相当好，但是高海拔仍给他带来了困扰。一是失眠，“醒来，无需看表，此时凌晨4点左右。窗外夜色淡然，房间漆黑，我像是被这浓浓的黑挤醒了一样。头脑介于清醒与混沌之间，躺着，无一丝睡意”。二是感冒，一旦感冒了总也不好，要拖一个月左右，而且80％的时间总像是处于感冒的状态中，他刚来时头发还是黑黑的，现在已经两鬓斑白了。但是朱钢坚持下来了，他说：“我是作协派来的干部，最起码也不能给作协丢人呀。”

正是克服了种种困难，朱钢在挂职中所做的工作受到了临潭县与甘肃省的高度肯定与表彰。2018年7月2日，《甘肃日报》以《哦，甘南》为题，对他挂职帮扶工作表现进行了报道；2018年9月，他被甘肃省评为“先进帮扶干部”。现在，朱钢已将临潭当作了自己的“第二故乡”。他说，他最引以为荣的是，临潭一共16个乡镇，他为每个乡镇都写了一首诗，而他现在正在做的，就是编辑一本《临潭脱贫攻坚作品选》。他说，“我很荣幸能在全国人民脱贫攻坚的关键时刻来到临潭，亲自参与了历史的进程，也想将临潭的经验描绘出来，见证现实的巨变，彰显文学的力量。”

《四川文学》研讨“文学同质化”问题

本报讯 近日，《四川文学》杂志社邀请陈思广、向荣、王棵、袁远等作家和评论家，就文学同质化问题在成都与读者进行研讨和交流。《四川文学》主编罗伟章，副主编卓慧、杨献平等参加研讨。与会者认为，文学创作是独特的精神创造活动，最应该讲究个性、讲究创新，尽量避免套路化、同质化，它要求作家深刻把握时代和社会的内在纹理，并将之进行内心化的处理，以个人的独特视角和语言构造出富有意蕴的文学世界。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同质化，但作家应该有自己的独特体验，以深刻的认识、丰富的想象对现实经验进行提炼和超越。（欣 闻）

首届飞云江端午诗会举行

本报讯 6月6日至9日，“首届飞云江端午诗会——当代诗歌的地域书写暨慕白诗歌创作研讨会”在浙江文成举行。活动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诗探索》杂志社、中共文成县委宣传部等单位联合主办。吴思敬、王珂、孟泽、王士强、阿毛等与会者谈到，我们应辩证理解地域性写作，一方面要强化地域特色，使作品具有独特性，另一方面要将之与普遍的人性、时代的脉搏更好地结合起来，使诗作更加具有时代的气象。慕白的诗歌写作立足于故乡“包山底”，真诚地发出内心的声音，同时又试图不断拓展写作的疆域。他的作品，无论是叙事还是抒情，背后都蕴含着深沉的情感。（欣 闻）

北京市曲剧团推出《林则徐在北京》

本报讯（记者 王觅） 今年是虎门销烟180周年。北京市曲剧团近期将推出新创剧目《林则徐在北京》，重现民族英雄林则徐的禁毒精神和爱国情怀。

据介绍，《林则徐在北京》将于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在北京天桥剧场首演，演出持续至6月30日。为贴合曲剧作为北京地方剧种的地域色彩，该剧将故事背景设置为林则徐在北京期间，将过去文艺作品中鲜少提及的禁烟之前的林则徐故事重新整理加工并搬上舞台，唱段也以尽量体现北京曲剧本体曲牌和原汁原味的唱腔作为创作标准。

新偶戏·儿童剧《叶限姑娘》首演

本报讯（记者 王觅） 6月7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2019年首部新戏——新偶戏·儿童剧《叶限姑娘》在京首演。该剧取材于唐代笔记小说《酉阳杂俎》，讲述了一个名为叶限的小女孩在逆境中仍心怀善良，最终收获幸福、继续前行的故事。

作为一部“新偶戏”，该剧在继承传统木偶精髓的基础上不断探索，给观众带来全新的观剧体验。演出中台词很少，演员们合力操控木偶完成各种动作，将自身表演能量注入木偶，使孩子们通过木偶的肢体语言感受到人物的喜怒哀乐。以景动偶不动的方式表现空间转换，通过调节灯光饱和度、亮度和质感的方式渲染环境，个性不同的角色主题旋律和烘托情感的背景音乐，为小观众们提供了放飞想象的空间。

据悉，该剧将持续演至6月23日，连演7场。

刘厚生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原副主席刘厚生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5月14日在京逝世，享年99岁。

刘厚生，中共党员。1940年开始发表作品，196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话剧情缘》《戏边散札》《剧苑情缘》《我的心啊在戏曲》《刘厚生文集》等。

董健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南京大学原副校长董健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5月12日在南京逝世，享年83岁。

董健，中共党员。1960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陈白尘创作历程论》《田汉传》《文学与历史》《启蒙、文学与戏剧》《跬步斋读思录》等。

孙健忠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原主席孙健忠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6月6日在长沙逝世，享年81岁。

孙健忠，土家族，中共党员。1956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死街》《醉乡》，中短篇小说集《娜珠》《五台山传奇》《乡愁》《倾斜的湘西》等。作品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霍忠义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长安大学文学艺术与传播学院艺术教育中心教师霍忠义同志，于2019年5月14日在西安逝世，享年50岁。

霍忠义，中共党员。201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作品《爱情音乐盒》《最爱》《心灵正能量》等。